

习近平民生系列重要论述的 主要来源与形成逻辑

贾玉娇

【摘要】 习近平民生系列重要论述有三大来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民生观、毛泽东思想中的民生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民生观；二是中国传统文化与政治文明中的民生观；三是习近平的人生经历与施政实践。这三大来源为习近平民生系列重要论述的形成提供了异常丰厚的土壤与养分，并使其超越了前人相关论述的历史局限性，对新时代中国民生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民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来源；形成逻辑

在深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转折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诞生与指引地位的确立，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作为这一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之一，习近平民生系列重要论述集大成了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中国传统文化与政治文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等思想精髓，以及习近平的实践经历，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事业和国际民生事业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习近平民生系列重要论述的规定性来源：马克思主义民生观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虽然没有十分明确且系统的民生阐述，但是民生成为隐含并贯穿其始终的核心要义，从中凝练出的民生观为习近平民生系列重要论述的形成提供了规定性来源。

（一）习近平民生系列重要论述的形成之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民生观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揭开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篇章，铺就出一条改善民生的实践之路，对共产主义社会及实践过程的原则性规定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创新的框架，成为习近平民生观的本体遵循。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构筑的思想体系可析出如下民生分析框架。

【作者简介】 贾玉娇，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专项“习近平民生思想研究”（18JF172）。

以人民为逻辑分析的起点。马克思、恩格斯建构起了人民群众的历史、社会“主体地位”，打破了唯心史观把人民群众视为什么也不创造的“精神空虚”的谬论^①，颠覆了传统社会中关于人民的种种错误观点，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决定历史发展的是“行动着的群众”^②。这标志着审视人类社会历史演变的视角发生了重大变化，人民进入全部人类社会实践的分析中心，由此展开民生的两个基本维度。一是生产的维度。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③。二是享有的维度。在马克思看来，无论在何种分配制度中，任何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是不存在的，各种公共资金与公益资金的扣除是必须的。分配原则与公共资金、公益资金的扣除比重直接影响民生实现的水平。

以人的存在形态为根本出发点。马克思笔下的民生发展即为社会改造与人的解放，即推动人的存在形态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的社会-个体双向互动过程。从人的存在形态所显现出来的社会关系上看，其分别是“人依附于人”“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其中，前两种情况被马克思称为“异化”。马克思借鉴费尔巴哈关于人的类本质的观点，阐释了人与生命活动、类本质和创造的世界之间的异化关系，深刻揭示出了资本主义是造成人类异化程度如此之重的根源。他同时指出，异化“是过去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④，异化劳动的自我扬弃成为推动未来人类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马克思发现当异化劳动达到极限时，亦即当劳动与资本的对立达到极限时，资本主义私有制“就必然成为全部私有财产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⑤，人类社会将迎来共产主义社会阶段。

以社会关系为分析范式。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⑥在此基础上，民生即为一切社会关系综合作用而产生的总体性结果，是其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关系的反映。一方面，从宏观上看，与生产力相对应的生产关系，以及与经济基础相对应的政治关系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构成外在于个体的社会客观存在。其重要意义在于，虽然民生实现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但是由生产力发展而带来的社会产品与财富并不能自动向民生转化，中间需要经历由上述社会关系而定义的一系列的政治社会过程。另一方面，马克思阐明了现实中的人不是社会客观存在的被动驱动者，而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个体。这一人类特性构成人民历史主体观与实践观的概念基础之一。然而，人的这一拥有强大能量的特质需要被唤醒和释放，才能发挥应然作用。恩格斯也指出，“人只须要了解自己本身，使自己成为衡量一切生活关系的尺度，按照自己的本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8-79、58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0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7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6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页。

质去估价这些关系，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根据自己本性的需要，来安排世界^①，从而使得人类社会成为带有目的性的人的活动的结果，推动民生发展。

政治是民生问题的实质。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民生的历史演进规律，科学阐释了民生内蕴含的政治、经济、社会关系，揭示出了向共产主义民生状态演进的政治实质，以及政治保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马克思面向他所处的资本主义时代，极大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民生失衡现象，深刻剖析了其内在的支配-控制的政治实质，主张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②，从根本上解决民生失衡问题。

以共产主义为目标指引。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后才能实现理想的民生状态。就共产主义民生的宏观状态而言，从生产来看，“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从分配来看，消除旧的分工，在初次分配前进行社会产品的六个扣除^③；就共产主义民生的最终实现状态而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通过实践实现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民生的最终实现状态；就共产主义民生的政权保障而言，《共产党宣言》揭示了无产阶级政权是民生实现的政权保障。

以实践为民生实现机理。从残酷现实到美好的民生图景，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艰难的实践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人与社会互动的机理——实践。在马克思看来，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把人及社会生活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之上，认为实践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将实践引入认识论与历史观，阐明了在现实客观性前提下，人民群众主观能动性转化为社会与历史客观性的内在机理。就民生而言，人在实践中改善了民生，同时也改善了人本身。可以说，马克思超越了旧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和宗教，寻找到了将信仰转化为现实的途径。

对社会主义民生的规定。马克思主义指出由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此转型过程中，存在一个必然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其从政治上看，既与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统治不同，也与共产主义的自由人的政治联合体不同，而是由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民生的政权保障；从经济上看，既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也不是高度充分的计划经济，而是由人民的代言人——国家主导或驾驭的市场经济，使市场中的资本服务于国家和人民；从社会中人的存在状态上看，具有“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并不断趋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过渡特征。由此可知，这一时期的民生始终处于变动到均衡再到变动的运动状态，亦即民生诉求与满足手段不断升级。

（二）习近平民生系列重要论述的形成之基：毛泽东思想中的民生观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人，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民生的思想与实践体系，成为习近平民生系列重要论述的底色与理论渊源。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样，毛泽东也鲜有提及“民生”，但是民生成为其思想与实践的发起原点与贯穿始终的主线，这突出表现在如下方面。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65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2-303页。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民生实践纲领。在毛泽东思想的民生观中,贯穿着“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民生实践纲领。在“相信群众”方面,毛泽东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视人民群众为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他强调“群众是真正的英雄。”^①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他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②在“依靠群众”方面,1925年毛泽东完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掌握了中国革命可以依靠的力量——农民。在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他进一步强调农民是拯救中国的最伟大力量。为此,毛泽东形成了整合、教育、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策略。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方面,毛泽东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③在此思想指导下,毛泽东始终高度重视民生问题,将其视为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法宝与优越性的体现。

民生实践中人的存在状态及制度实现。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在保障人民劳动权利,促进人民劳动的同时,注重保障劳动力再生产,提升劳动力素质。围绕于此,形成了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在经济建设方面,经过3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确立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计划经济体制,运用国家力量保障经济生产成果惠及广大社会成员,逐步提高民生水平;在政治建设方面,创新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体,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在社会建设方面,建立起面向所有人民群众的劳动与社会保障制度,如制定劳动保护政策、劳动保险条例、重视卫生防疫工作,保护劳动力再生产。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发出重要指示,要求各地逐步把人力、物力、财力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这一指示被称为“六·二六”指示,得到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高度评价,被誉为以最小的投入获得了最大健康收益的中国模式。^④

民生实践的复杂性。从毛泽东的相关讲话与文章中,可提炼出一个由动态、多元关系交织构成的复杂的民生体系。具体说来,包括以下关系。一是当前民生需求与长远民生需求满足的关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同时承载着不同社会历史阶段建设任务的复合型工程。因此,需要在长远的民生目标指引下,一方面明确一段历史时期中的社会主要矛盾,循序渐进地向实现长远民生需求满足的方向迈进;另一方面应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有限资源背景下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诉求。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对此进行了深入阐述。二是国家整体利益与个体民生诉求满足的关系。毛泽东一方面打造与社会主义民生实践相适应的人,将改造社会、实现共产主义和改造自身、净化自己的思想灵魂相结合,形塑出“纯粹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社会主义新人。另一方面,在民生实现的现实过程中,强调处理好国家、集体与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通过兼顾三者利益,实现社会生产力发展,国家工业化水平提升,人民物质和文化需要不断满足的三方共赢。三是生产与民生水平的关系,抑或经济发展与民生的关系。这一关系集中体现着人民的长远利益、整体利益和眼前利益或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毛泽东认为工作的重点必须放在发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9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31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4-1095页。

④ 郑功成:《社会保障与国家治理的历史逻辑及未来选择》,《社会保障评论》2017年第1期。

展生产上,但发展生产和改善民生二者必须兼顾。四是中心任务与民生的关系。基于中国民生实践的复杂性,毛泽东指出应该抓住主要社会矛盾,明确一定历史时期中的中心任务,在确保长远民生需求的前提下,突出民生内涵的阶段性特征。

政治贯穿中国社会主义民生发展始终。毛泽东强调:“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①对中国而言尤为如此,这是因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这一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中间过渡状态,在经济上含有与资本主义相同的因素,只有始终保持政治性,才能确保经济发展服务于人民群众。毛泽东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可以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建设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需要加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的大众化,使之为广大党员和群众所掌握。只有实现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被群众掌握,才能产生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三) 习近平民生系列重要论述的创新之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民生观

1. 邓小平理论中的民生观

邓小平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其中的民生观是对毛泽东民生观的继承与发展,是对毛泽东规划的阶段性任务的具体实践。可将邓小平理论中的民生观凝练为以下几点。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视域下的民生观。结合邓小平理论可知,“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是改革开放时代民生实践的出发点;“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是民生实践效果的判断标准;人民既是物质财富的享受者,也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对民生主体所具辩证性的说明。

在回归社会主义本质中定义民生。一方面,以解放发展生产力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必要路径。毛泽东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②邓小平对此进行了阐扬,认为“我们讲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③。他指出,要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为民生的直接目标。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和建设的根本目的。为实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中国创造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自由配置两大机制糅合在一起,极大地释放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活力,将中国民生事业发展推向新的历史阶段。

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民生实践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压缩式的,即原本在西方国家线性经历的过程片段式在短时间内同时在中国投放,使得中国民生发展环境极为复

①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4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79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3-64页。

杂。只有在千头万绪中理出一条发展的思路,确立发展的主要矛盾,才能循序渐进地、一步步地实现新中国的百年梦想。对此,邓小平进行了时间纵向维度与空间横向维度的规划。从时间的纵向维度上看,邓小平认为,解决民生问题必须分步进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提出了“三步走”战略。从空间的横向维度上看,邓小平提出两个大局,指出一个大局是东部沿海地区加快对外开放,使之先发展起来,中西部地区要顾全这个大局;另一个大局是当发展到一定时期,比如20世纪末全国达到小康水平时,就要拿出更多力量帮助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东部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以“小康社会”为民生实践目标。“小康社会”源于中国古代思想家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想象,其所展现出的是一幅美好的民生景象。邓小平用小康社会表达特定阶段中国民生实践目标,并赋予了小康社会新的内涵。邓小平指出到20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衡量小康社会的主要指标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并未达到经济富足,民生水平介于温饱与富裕之间。

民生实践中的人及制度实现。在宏观制度形塑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人的存在状态发生巨大变化,由原来单位社会中的非商品化的人转变为半商品化的人。具体说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机制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劳动力市场开始形成,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完善不断扩大,开启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与商品化进程。与此同时,以国企改革配套制度出场的社会保障制度,也伴随市场经济变革而带来的新风险开始趋向完善,逐渐勾勒出一个保护劳动力的去商品化机制框架。由此,以劳动力市场为主要基础,市场经济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共同构筑出人的商品化与去商品化体制,使得社会成员进入马克思所提出的“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状态。

2.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中的民生观

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深刻揭示了发展、执政与民生的辩证统一关系,明确提出了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关注民生作为党长期执政的基石。在此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生产力水平大幅提升,提高了民生整体水平。

相较江泽民执政时代,胡锦涛将民生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将“保障民生、改善民生”作为国家的根本大计。^①胡锦涛强调以人为本的思想,将人民置于共产党人权力观、发展观的中心位置,指出执政为民,就要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使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更多地体现到改善民生上。胡锦涛将民生理念注入经济社会发展中,指出人是发展的目的,经济建设和生产力发展是实现民生诉求的手段,强调形成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提出共建共享,加快推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推动民生事业发展。

^①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第1版。

二、习近平民生系列重要论述的机理性来源：中国传统文化与政治中的民生观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生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政治伦理得以产生的根基，其内蕴含丰富的民生意涵。

将人作为民生分析的起点。《周易·彖辞传》曰：“天地之大德曰生。”^①意为天地最大的恩德是使各类生命各得其所，安身立命。其中，人虽与其他生灵都一样得到天地之气成形，禀天地之道成性，但人为天地之心，万物之灵，最为尊贵。老子认为，“人”是宇宙中最伟大之创造物。他指出：“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由上述思想可知，与西方以己为内核的理性人假说不同，中国的“理性人”是具有灵性，与天地万物相包容的存在，由此形成中西方不同的民生分析前提。

对民生的表述。何为民生？中国古代先哲们对此有丰富的论述。大体上，可分为勤民、富民和养民。《左传·宣公十二年》引古箴言：民生在勤，勤则不匮。^②《三国志·吴书·骆统传》中有云：财须民生，强赖民力，威恃民势，福由民殖。^③综合说来，勤劳从事生产，不仅可以创造自身的幸福生活，还会给国家带来财富和福气。《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条》中指出，以人为本，以财为末；人安则财赡，本固则邦宁。^④孔子认为富民是富国之本，要使人民富裕起来，先使民足食。《论语·颜渊》载：“足食，足兵，民信之矣。”^⑤荀子主张“裕民”^⑥。墨子主张消除“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的“三患”，以满足民众基本的民生需求，使“劳者得息”。

对民生所包含的社会关系的阐释。就国家—个体关系而言，民既是国之本，也需要国家对其进行教化。在中国传统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民本思想，凝聚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理性。大体上，可将民本意涵分为三种。其一是民为天本。在我国最早的史书——《尚书》中记载，“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⑦“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⑧。其二是民为邦本或为国本。《尚书》中记载“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⑨《吕氏春秋》有云“主之本在于宗庙，宗庙之本在于民”^⑩。其三是民为君本。《春秋谷梁传·桓公十四年》中提出，“民者君之本也”^⑪。“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⑫从国家对民

① 来知德集注：《周易》，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28页。

② 左丘明：《左传》（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62页。

③ 陈寿：《三国志人物全传》，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5年，第1191页。

④ 陆贽：《陆宣公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47页。

⑤ 黄怀信等：《论语汇校集释》（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083页。

⑥ 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第153-154页。

⑦ 李民、王健：《尚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8页。

⑧ 李民、王健：《尚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95页。

⑨ 李民、王健：《尚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93页。

⑩ 高诱注：《吕氏春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62页。

⑪ 范宁等：《春秋谷梁传注疏》，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第63页。

⑫ 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第504页。

的教化来看,老子主张教化人民控制欲望,崇尚节俭,“塞其兑,闭其门”^①。孔子提出“为政以德”,认为只有用道德去教化百姓,使百姓自觉遵从既定的道德行为规范,百姓才会真正有羞耻之心,才能安分守己,服从国家管理。

就家-国在民生保障的责任分担而言,家族在经济上彼此顾恤,互相负责,有不然者,群指目以为不义。在社会上,家是中国人的初级保障组织,同时也是给予个体保障的主要组织。家族赋有保障幼有所长所学、壮有所娶所劳、老有所养所终的职责。利用宗族、乡党间共有财产发展出了祭田、义庄、义学、社仓、义仓、学田等,以作为救济孤寡贫乏和补助教育之用;就国家责任而言,《国语·楚语下》有云:“夫从政者,以庇民也”。具体说来,国家庇护的主要措施包括救济、生息、安养三个方面。

就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而言,中国古代思想家纷纷主张“俭”“节用”。墨子认为,加强生产可以增加财富,倡导“节用”则可以减少社会财富的消耗,开源与节流对于增益民众福祉、推进民生建设十分重要。墨子指出:“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②“古者明王圣人,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彼其爱民谨忠,利民谨厚,忠信相连,又示之以利”^③。

对理想民生状态的表述。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存在诸多关于理想社会的整体性构想。其中,“小康社会”是在“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背景下出现的一种理想社会形态。这一社会形态在“礼”的规制下,社会稳定有序运行,人们依据既定的社会行为标准行事。中国古代对于“小康”的论述,最早见于《诗经·大雅·民劳》。在《礼记·礼运》中孔子将“小康”一词上升为一种社会模式,指出“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孰者去,众以为殃,是为小康。”^④继承孔子的思想,孟子后又对王道下的“小康社会”进行了具体化阐释。理想民生的思想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深入人心,这点可从历朝农民起义的口号中窥见一斑。如唐朝黄巢起义提出的“天补均平”;南宋钟相、杨么起义提出的“等贵贱,均贫富”;明朝李自成起义提出的“均田免粮”;清朝太平天国运动提出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清朝同盟会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这些源自先哲的表述与百姓传承的主张,无疑对中国传统政治有着重要影响。

(二) 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民生观与实践

翻开中国历史,因民生问题恶化而造成朝代更迭似乎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公例。^⑤与之相反,有为之君的民生实践及其遵循的政治伦理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中国稳定、延续的

① 陈剑:《老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91页。

② 毕沅校注:《墨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90页。

③ 毕沅校注:《墨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90页。

④ 陈澧注:《礼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49页。

⑤ 郑功成:《构建和谐社会要以民生为本》,《前线》2007年第5期。

政治密码。在中国历史上少数重视民生的朝代，都在中华文明史上留下辉煌一笔，形成流芳百世的盛世佳话。如汉代“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清代“康乾盛世”，都基于重视民生而采取救济、生息、安养等措施^①。

早在周朝，中国就已经出现了较为完备的救济、生息、安养政策，名曰十二荒政和保息六养。战国时期，梁国通过“移民就粟”和“调粟振民”之法来避灾保民；齐国晏子借筑路台之机，以工代赈。到汉朝时，救济开始制度化，正式确立了常平仓制度；还在汉初建立过行之天下的老年人福利制度（王杖制）。唐宋时期的救助政策趋于成熟，施行仓储制以防灾荒，有正仓、转运仓、太仓、军仓、常平仓、义仓等。武则天时期出现由寺院创办的慈善救助机构——“悲田养病坊”，专门供养贫困老人、病人、残疾人及孤儿。到宋朝时，安养机构迅速发展。最早出现的安养机构是北宋时期建立的福田院，采取政府和寺院合力管理模式；后宋徽宗崇宁年间，设立居养院；此外，还针对患病的贫民建立了安济坊。南宋初年，出现了具有医养结合性质的养济院，兼顾居养院和安济坊功能。到元明时期，仓储制度更加完善，“立义仓于乡社，又置常平于路府，使饥不损民，丰不伤农，粟直不低昂，而民无菜色，可谓善法汉、唐者矣。”至清朝，将常平仓和社仓（义仓）建设成为一种日常制度。由上可见，中国传统政治的好坏评判，是以如何对待民生并视民生实践效果为基本依据的。

三、习近平民生系列重要论述的实践性来源：习近平的人生经历与施政实践

习近平民生论述的形成还有一个重要且特殊的来源，就是习近平本人的亲身经历与实践。从1969年到2018年的49年中，从村大队书记、县委书记、市委书记到省委书记、国家领导人，再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一路走来，始终扎根人民，情系人民，坚守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不变，在时代的变迁中，不断实践出具有强大历史穿透力与现实解释力的民生论述。

（一）七年下乡经历中的民生体悟与实践

习近平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在中国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人民领袖。从1969年到1975年，习近平在陕西省梁家河村度过了长达7年的知青岁月。这段经历促使他形成了强烈的人民情志与民生情怀，形成了踏实、自强不息、自信的品格，铸就了后来领导人民开展艰苦卓绝的民生实践的能力。正如习近平所言，上山下乡的经历，使他形成了脚踏实地、自强不息的品格。脚踏在大地上，置身于人民群众中，会使人感到非常踏实、很有力量。基层的艰苦生活，能够磨练一个人的意志，以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想起在那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还能干事，就有一股遇到任何事情都勇于挑战的勇气，什么事情都不信邪，都能处变不惊，克难而进。

（二）地方施政中的经历与实践

从1982年到2007年是习近平在地方施政的时期，在这25年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村域到省域，伴随习近平实践层次的提升，其民生论述的基本内涵逐渐形成。

^① 郑功成：《社会保障与国家治理的历史逻辑及未来选择》，《社会保障评论》2017年第1期。

从价值立场上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心中装着群众,事事为人民打算”。习近平指出,“牢记政府前面的‘人民’两字”^①“只有心中装着群众,事事为人民打算,才能得到群众真心实意的支持”^②。在福州任市委书记期间,为解决船民搬迁上岸问题,习近平登上低矮逼仄的连家船,实地察看船民的生活,登岸之后,立即召开现场办公会,部署解决船民的生活问题。在担任福建省省长期间,习近平在接近40摄氏度高温的正午,走进拥挤闷热的福州苍霞社区棚屋区,与各级干部一起亲身体验群众疾苦。

从工作方法上看,坚持扎根基层,“一事一报”,坚持“关注民生”与“对上级负责”的辩证统一关系。习近平扎根基层,一方面切实了解人民疾苦,另一方面发现解决问题的办法。习近平一到宁德赴任,就一头扎进了基层。在调研后,习近平提出“弱鸟先飞”“滴水石穿”的反贫困思路。习近平非常重视“一事一报”,他交代身边的工作人员,“凡是群众来信,一律都要交给我过目”,并要求做到四个“亲自”——亲自研究、亲自部署、亲自批阅、亲自查办。

在干部培养上,将重视学习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结合起来,始终保持“理论高度与实践深度有机结合”。习近平将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加强党建的重要抓手。据在宁德与习近平共事的人回忆,习近平到宁德上任,别的行李少得很,却带了几大箱书。这与习近平当年下乡到陕西梁家河一样,也是带了几箱书。可见,读书学习成为习近平的生活方式。习近平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领导干部,如果不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如果不用马列主义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他要在革命斗争中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增强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是不可能的。

在工作路径上,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由民生主导各项事业建设。习近平在任福建省省长期间,率先探索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被称为“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中国农村的又一场伟大革命”。2002年6月,习近平赴龙岩市武平县进行专题调研,在听取汇报和实地调研后,习近平强调指出:“林改的方向是对的,关键是要脚踏实地向前推进,让老百姓真正受益”,并要求“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要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从山下转向山上。”^③这场改革持续15年,为福建保护生态、农民增收带来巨大活力。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身体力行,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始终把人民放在最高的位置。

(三) 十八大以来的经历与实践

十八大以来的治国理政时期是习近平民生系列重要论述形成的关键时期。在这一阶段中,习近平民生系列重要论述突破具体时空局限,在更广阔和更深远的视域中延展开来。在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站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高度,基于人民的立场,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审时度势,运用其卓越的政治智慧,秉持道行致远、不忘初心的信念,信守青年时代立下的为人民奉献自己的誓言,坚定不移地践行民生价值追求,研判与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

① 参见《福建省省长习近平:牢记政府前面“人民”二字》,《人民日报》,2002年3月4日。

② 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62页。

③ 吴毓健等:《改革争先 击水中流——习近平总书记福建的探索与实践·改革篇》,《福建党史月刊》2017年第9期。

生实践道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推动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为破解世界民生难题起到积极的引领与示范作用。在治国理政体系的全面升级与深化改革过程中,习近平民生系列重要论述更具全局性、系统性、整体性与长远性。

始终保持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政治优势。习近平将民生问题置于持续、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的历史进程中,强调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发展民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确保经济发展成果向民生转化这一政治过程的真正实现。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与政治灵魂,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①为始终保持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本色,习近平高度重视党建工作,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千方百计为人民谋利益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党和政府的所有工作都属于为民办实事范畴。”^②

形成以人民为中心推进发展的全局性部署。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首次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对“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理念的继承和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是将增进人民福祉贯穿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2015 年 11 月 23 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要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③贯彻落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一个系统、着眼长远的过程。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指出,“不是推进一个领域改革,也不是推进几个领域改革,而是推进所有领域改革”。为全面打赢这场深化体制改革的硬仗,习近平作出了全盘规划,提出“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战略目标,“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的战略抉择,经济新常态、供给侧改革的战略措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注入新的时代内涵。

形成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着眼点的民生系统。何为人的全面发展?从习近平的表述中可知,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在于人的劳动能力的全面发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智力、体力与创造力的统一发展过程。习近平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④。围绕于此,建构起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制度体系。习近平民生系列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前线》2017 年第 11 期。

② 习近平:《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 年,第 528 页。

③ 习近平:《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 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1/24/c_1117247999.htm, 2015 年 11 月 24 日。

④ 参见《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日报》,2012 年 11 月 16 日。

重要论述超越少数人和一国的狭隘视域,着眼于全人类的解放,积极影响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实现这一理想状态。在这条探寻历史规律、寻求自身解放的接力过程中,习近平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吹响民生的时代号角,在国内全面深化改革的同时,在国际社会上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主张。

整体民生视域下正确处理好发展与民生、国家与个人这两对基本关系。就发展与民生关系而言,习近平提出,始终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回答了“发展为了什么、发展成果由谁享有”这一根本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指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最主要的还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①“我国现阶段存在的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许多是发展中的问题,是能够通过不断发展,通过制度安排、法律规范、政策支持加以解决的”^②。习近平同时指出抓民生也是抓发展。要在保障基本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基础上,积极引导群众对居家服务、养老服务、健康服务、文体服务、休闲服务等方面的社会需求,支持相关服务行业加快发展,培育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在论及国家与个人的关系时,习近平深入阐释了共建共享的基本原则,要求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习近平强调个体应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投身到国家建设和争取个人幸福的过程中来,指出“幸福不是毛毛雨,幸福不是免费午餐,幸福不会从天而降。人世间的一切成就、一切幸福都源于劳动和创造”^③。他强调国家不仅承担保障人民公平享受发展成果的责任,还承担保障人民享有劳动与发展机会的责任,指出“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④。

此外,习近平深刻阐释了享有与个体美好生活体验之间的辩证关系。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并不是个体获得越多就能产生越多的美好生活体验。相反,为了整体利益和子孙后代的幸福美好牺牲一定的个人利益,会使个体产生源于社会共同体本能的幸福感。习近平曾在《摆脱贫困》一书中提出“滴水穿石”,是前仆后继、勇于牺牲人格的完美体现。一滴水,既小且弱,对付顽石,肯定粉身碎骨。它在牺牲的瞬间,虽然未能看见自身的价值和成果,但其价值和成果体现在无数水滴前仆后继的粉身碎骨之中,体现在终于穿石的成功之中。在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在一个经济落后地区的发展进程中,都应该不追慕自身的显赫,应寻求一点一滴的进取,甘于成为总体成功的铺垫。^⑤执着奋斗,久久为功,这本身就是一种美好生活的体验,循环往复,逐步实现理想的美好生活。

① 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求是》2014年第1期。

② 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求是》2014年第1期。

③ 《习近平寄语全国各族少年儿童:美好的生活属于你们 美丽的中国梦属于你们》,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n/2015/0602/c64094-27088929.html>,2015年6月2日。

④ 习近平:《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13lh/2013-03/17/c_115052765.htm,2013年3月17日。

⑤ 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7页。

四、小结

通过对习近平民生系列重要论述进行追本溯源,可以发现,不同来源在其形成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同的。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经典作家对共产主义社会及实践过程的原则性规定成为习近平民生论述的本体遵循;毛泽东思想中的民生观成为习近平民生系列重要论述的底色与理论渊源;邓小平理论中的民生观成为习近平民生系列重要论述的直接来源与创新对象;“天人合一”是中国上千年来政治法则的精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机融入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治理之中,成为习近平民生系列重要论述的机理性来源,凸显与强化了习近平民生系列重要论述的中国性;习近平的个人经历与实践则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和具体实际相结合,创新形成了习近平民生系列重要论述。

Major Sources and Logic behind the Formation of Xi Jinping's Important Discourses on People's Well-being

Jia Yujiao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three main sources of Xi Jinping's important discourses on people's well-being: (i) the views of Marxist classical writers and Mao Zedong's thoughts on people's well-being, and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i)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iii) Xi Jinping's life experience and political experience. The three major sources provide the breeding ground and nutrients for the formation of Jinping's important discourses on people's well-being, surpass the limitations of previous discourses and have a significant and far-reaching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eople's well-being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people's well-be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ain sources; logic of formation

(责任编辑:郭林)